

明代北方漢語方言入聲韻類概論

呂 昭 明

松 山 大 学
言語文化研究 第33卷第2号 (抜刷)
2014年3月

Matsuyama University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Vol. 33 No. 2 March 2014

明代北方漢語方言入聲韻類概論

呂昭明

摘要：本文主要以徐孝〈合併篇韻字學便覽引證〉、張位《問奇集》和陸容《菽園雜記》所記載明代北方漢語的語料為論述基礎，嘗試為明代北方漢語入聲韻類現象及其成因，提出一個可能的解釋。

第一，依張位《問奇集》所描述概念劃分出“通語層 (The standard language stratum) / 方言層 (The Dialect stratum)”兩個層次。

第二，依明代張位《問奇集》和陸容《菽園雜記》所記錄語例，及其於現代北方漢語方言調查語料的音讀形式，將入聲韻類歸為三種類型：

一，‘通語層’的單一類型，亦即漢語語音史所言入聲韻尾全然失落的類型。

二，至於‘方言層’的兩種類型。其一，即今日北方漢語方言區仍然保持喉塞音韻尾 / -ʔ / 的類型，其二，受阿爾泰民族語言影響而殘存的方音現象，亦即長短元音轉為高低元音區別（或兼帶有 -ʔ 韻尾）的入聲韻類類型。關於方言層的第一種類型，與明代洪武年間山西移民，及其後永樂年間的江浙移民，或許有其密切的關聯性。至於方言層的第二種類型，需要觀察北方漢語方言於元明時期，其與蒙古語族的語言接觸問題 (language contact)。藉由服部四郎、栗林均兩先生的相關研究，本文嘗試提出明代北方漢語方言長、短入聲韻類，很可能是受到蒙古語母音調和影響下的音韻現象。

關鍵詞：北方漢語 (Northern Chinese)、蒙古語 (Mongolian language)、母音調和 (vowel harmony)

1. 論題的提出

明萬曆年間，金臺徐孝於其所著〈合併篇韻字學便覽引證〉附記了當時北京地區入聲韻類結構的描寫內容，亦即“入聲為‘長入’、‘短入’的區別”，而其音韻條件 (phonological environment) 則為“元音高低”的影響所造成的聽覺感

知。值得注意的是，徐孝於其所著《合併字學集篇·部頭歌訣》當中，留下一段頗為難解的文字：‘不期遭際靖康年，聖道顛頽流金虜，金人番音淆漢音，傳訛沮壞難觀觀。’雖僅是四句短文，然則‘金人番音淆漢音’具體意涵為何？是否代表漢語和阿爾泰語系語言，其語言接觸的實況？如何可能透過有明時期文獻語料，論證徐孝說法的可能性？此為本文的基本問題意識。為了繼續思考徐孝所留下的問題，本文嘗試透過服部二郎與栗林均兩先生於蒙古語文的相關研究，以及明代張位《問奇集·各地鄉音》、陸容《菽園雜記·卷四》的兩部份語料，進一步說明明代北方漢語方言長、短入聲韻類結構，很可能是受到蒙古語母音調和影響下的音韻現象。

宋元時期北方漢語區域，其語言環境曾受到西夏、契丹、女真等阿爾泰語族的影響，從而添附了異質屬性，這已然為語言的同質性原則帶來變數。然則，除西夏文獻之外，今日所存契丹大小字，抑或女真文字，在文獻數量相對不足的條件下，若欲論其系統性恐有實質困難。倘若再回到歷史發展的進程，基於元代蒙古語族相較西夏等部族‘漢化’(sinification)為深的歷史因素，元明時期北方漢語與蒙古語族的語言接觸實況，便相較可能進行有關的設想與分析¹。

假若A、B可分別代表漢語和蒙古語，當A、B兩語言接觸時，兩者個別語言系統內部，其本質上雖不易發生變異，然而語音(phoneme)、詞彙(lexicon)層面滲入異質成份的可能性則無法排除。次者，如果再加入A、B兩語言接觸的時空背景，以及兩語言區域鄰接與否等因素，則A、B兩語言相近或是相同的語言現象(language phenomenon)，恐怕非語言普遍性(universals of language)一語可概括之。換個角度思考，當時空背景相近的兩語系語言具有相同的表層現象(surface structure)時，先行假設兩者形成過程的成因，實為語言接觸所成，應有其合理性。至於這個假設是否成立？得經過一個可能的論證程序，即是以兩語言的歷史文獻語料進行觀察。誠然，藉由兩語言內部的現代方言變體(dialect

¹ 關於明代南方方言的地理分布問題，根據明袁子讓《字學元元》的資料，約略可以‘長江’為分界標準。簡而言之，明代‘北方方言’指的是山東、河北、山西、陝西和甘肅等區域方言；‘南方方言’則為江西、湖廣、四川、福建和浙江等區域方言。

variant)，固然可能尋求出邏輯上的推導程序，卻無法避免該變體的產生，是語言接觸之後某種後起的因素所成。當然，設想可有多種途徑，本文僅能採取其中的一種作為初步的分析。

本文的論題，可以服部四郎（1939）為前導，服部先生談到：

（1）明清之後，在蒙古語書面語的文獻語料當中，並不乏被認定為依照類推原則的古語化現象。為了表現“‘ā’、‘ē’、‘ū’”等等長母音形式，而書以“‘aya’、‘ege’、‘ayu’”等等形式。“北京”begejing的‘北’（bege），並非是反映入聲韻尾存在的時代，而是入聲韻尾全然失落之後，寫成‘ege’的長母音形式²。

針對蒙古文長母音的問題，栗林均（1984）先生引證德、俄學者的看法，則又言及：

（2）對應於現代蒙古語長母音的書寫形式，其古語形的代表特徵之一。即是現代蒙古語的長母音，在古蒙文所反映的形態表現，可以視為經兩階段所派生的產物，亦即以‘V_YV~VgV’此語音連續的形式，經子音‘y’‘g’弱化以致失落，使得原先兩母音縮合為一個母音的過程³。

具體而言，服部四郎、栗林均兩先生的思路，可分為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當入聲韻尾失落，長母音寫作中介‘g’而為‘ege’的形式。第二個層次則為‘g’弱化消失而為‘ee’的複合形式‘ē’。兩先生的基本思路實以八思巴文的拼

² 原文：明代、清代以後の文語の文獻には類推による古風化の現象が少なからず認められると思う。長母音 ā, ē, ū などを表すために, aya, ege, ayu などと書く。begejing『北京』の bege はシナ語「北」の入声尾が保存されていた時代の発音を反映するものではなく，入声尾の落ちてしまった後の長母音が ege で写されているのである。

³ 原文：現代蒙古語の長母音に対応する蒙古文語の正書法は，そのような古風さを示す代表的な特徴のひとつに数えられる。……すなわち，現代蒙古語の長母音は，蒙古文語に反映されている状態，すなわち V_YV ~ VgV という音連続から，母音間の子音 y, g が弱化，消失して，二つの母音がひとつの母音に縮合する過程で二次的に派生したものとみなされてきた。

法與現代蒙古文比較而得。有趣的問題是，觀察明代北京地區文獻語料與當代河北方言的調查報告，蒙古文的長母音現象，產生了某種程度的啓示作用。根據明徐孝〈合併篇韻字學便覽引證〉所提供的語例及其說解內容，明代北京區域的入聲韻類，具有長入和短入的區野。簡略說明其所示如（3）的語例（此處所引用構擬形式為董同龢先生的中古擬音，本文轉以音位概念改寫）：

- (3) A. 胡 /-o- / : 斛 /-u- / B. 霞 /-a- / : 匣 /-a- /
 C. 時 /-i- / : 石 /-ε- / D. 扶 /-o- / : 伏 /-u- /

首先，如何解讀（3）的字例關係？其一，依徐孝“入聲亦有隱互於平聲”的說法，其所指稱當為B組濁入‘匣’與濁平‘霞’在元音條件相同下，加以‘匣’ /-p / 韻尾失落而歸併的情況。其二，再依徐孝所謂“詩人忽略於長短之別”，其所列舉語例則是濁入‘匣’‘石’所呈現元音音位“/-ε- / : /-a- /”高低的對比關係。（請參看3.3節）

次者，當採取上述的解釋策略說明文獻語例的音韻關係，研究者需要回答的問題至少有二：

一，此種論述策略，無疑認定文獻語料的直接來源為中古時期“書面語”的系統，這個假定自然需要羅列出有效的論證過程。特別是明清時期的文獻語料，有相對數量是與此假定有所衝突的。因此，重新詮釋漢語各歷史時期文獻語料，恐得依循文獻內容，為個別文獻設立不同的解讀依準（postulate）。

二，以徐孝所著《重訂司馬溫公等韻圖經》、〈合併篇韻字學便覽引證〉等內在關係密切的材料為例⁴，徐孝是以萬曆年間的北京方言為描寫對象。換言之，（3）的現象，依照中古條件雖可獲得某種程度的解釋，仍需透過現代北京鄰近區域方言調查的種種線索，特別是共時性的音韻徵性（distinctive feature），以深入解釋音類結構內部的層級關係。簡單說來，若再對照《河北方言概況》（1961）

⁴ 關於〈合併篇韻字學便覽引證〉和《四聲領率譜》兩部分語料，需參酌北京圖書館藏本。

所歸納的三種入聲韻類類型，依照調查者所描寫的音韻行爲（phonological behavior），則可能能夠爲徐孝所提供的文獻語料，提出更進一步的設想與論證基礎。試徵引於次：

（4）a. 帶喉塞音 [-ʔ] 的入聲韻母，聽起來聲音短促，讀出時好象有輕微的咳嗽聲一樣，河北方言中有的地區喉塞音明顯，有的地區很輕微。b. 聲音短促而無喉塞音的入聲韻母。c. 河北省石家莊專區有平山、建屏、獲鹿、贊皇、元氏、靈壽等六縣有入聲韻母，但聽起來聲音不太短促。

爲了便於解說，本文將原先（4）的文字截分爲 a、b、c 三部分。（4）的內容是河北方言調查者於該地區“音韻現象”（phonological phenomena）的直觀描摹。當採取歷史比較法的研究模式，研究者所考量的是邏輯形式對應規律的嚴整性，以至於方言調查報告內部的語音描述文字，並未受到足夠的認識。值得注意的是，現階段漢語方言各區域方言調查報告，在有關語音層面的描寫詳略不一（含括發音部位 articulation place 與發音方法 articulation manner），直接影響了語音（phonetic）和音位（phonemic）關係深入探究的種種可能。同時，也間接影響了研究者對於某個漢語方言區域，各字例音韻層次關係的分析。從某個層面而言，如何可能客觀檢證各聚落內部個別代表發音人，抑或聚落內部群體發音人，其個別音韻變體的溝通度？仍有待學者們進一步的討論以形成共識。其次，（4）的文字內容所涉及的是漢語方言音韻的區別徵性（distinctive feature）問題。具體說來，此雖非歷史比較法所考量的條件，然而針對漢語各方言歷史音韻規則序列的描寫，恐怕仍舊得再考量到各區域方言發音人以及調查者的“聽覺直感”⁵。

現在，若將（3）、（4）對照（1）、（2）的說法，則可以追問三組可能的問題，亦即：

一，“平山、建屏、獲鹿、贊皇、元氏、靈壽等六縣”具有入聲韻母的地區，

⁵ 如何這個問題納入漢語各區域方言進行語音實驗，進而取得相關數據資料？很可能是個有趣而艱難的課題。

何以其人聲“聽起來聲音不太短促”？

二，北方漢語方言是否亦曾經歷過“長元音”的階段，從而使得某些入聲韻類在聽覺感知（perception）層面“不太短促”？是否與元末明初的北京地區蒙古語族的影響有關？

三，為何徐孝則是認定當時北京為“金人番音淆漢音，傳訛沮壞難觀睹”？能否藉由明代的漢語方言材料，繼續思索入聲韻類的類型問題？

此外，處理明清時期漢語文獻語料，尚有一個與語言非直接聯繫的因素，即是‘移民’史料的問題。而這一點很可能是採取歷史比較法研究漢語史，需要重新正視的問題。接續前文的說法，漢語和蒙古語分屬為兩語系，在同質環境之下，其內部發展可純粹採取歷史比較法的理論概念，建立起各自形成、衍生的程序。這個設想可以不考慮歷史、地理等外在因素（external factors），甚至於歷史性文獻語料是否曾經存在亦非其所重。相對言之，其所面臨的檢證步驟，可能相對複雜而非更為簡易。換言之，明代北方漢語與蒙古語文，因語言接觸形成的異質環境，恐怕無法單方面否定其產生質變的可能性。即便不考慮非漢語的因素，明清時期官方移民政策，導致方言變體間的疊置（overlapping）、分布（distribution）等等現象，仍需嚴格對待。進一步言之，在相近區域與時間的條件下，不同語族的語言接觸（language contact）是一個問題，同一語族的方言接觸（dialect contact）則是另一個問題。遠藤光曉（1980）先生言及漢語東北方言的聲調調值問題的相關看法，可以作為此問題延展的起頭，請看：

（5）遼東半島、河北省與山東省連界的部分區域，以及濟南市、山東省的部分區域，呈現出所謂 [213] [324][214][313][312] 的五種升降調，不過，若是單由陸路觀察分佈的情況，則不能對於這種現象獲得解釋，比較可能是經由海路傳遞而來。遼寧省有許多居民是在十九世紀初，經由陸路、海路，從河北、河南、山東而來。從陸路而來的人們，首先是由西部移入，其後再由北部和其他地區持續擴大移入的人口數，至於從海路移入的人們，首先是進入遼東半島和遼河平原，其後則可說是往遼寧省的東部和東南部的區域持續擴增⁶。

(5) 的解釋思路於本文的啓發，即在於藉由聲調類型推估移民的來源與方向。此處需要補充的觀點是，儘管本文的基底假設仍是服膺音韻邏輯不等於歷史邏輯的觀念，然而面對明清時期的移民政策，對於人口結構的改變與重整，及其於各區域方言的直接影響，可能直接衝擊到該假設的適用性。以此整合前文所述內容，則可再提出下列兩組問題：

一，單純由‘陸路’思考明代移民與人聲的聯繫性，是否可由‘海路’再加以補充論證過程？明代除了充實京師的‘移徙政策’外，何以明太祖、明成祖又有‘海運’的策略？

二，丁邦新（1982）先生歸納各家劃分方言的標準時，可以清楚發現韻母、聲調各有兩項條件，幾乎各家皆無異議，其一，韻母方面，以古塞音、古鼻音韻尾演變為準。其二，聲調方面，以調類分合、入聲演變作為劃分標準，但是，入聲塞音、鼻音韻尾失落後，如何與其他調類歸併？又呈現什麼樣的類型演變？其中最重要的‘音韻條件’（phonological environment）為何？而漢語方言入聲韻類的演變，是否又與明代海運、河運有所聯繫？似乎皆是值得繼續追問的課題。

整合前文的內容，簡單歸結本文所要討論的四組問題如次：

一，明代北方漢語方言的相關語料，能否作為思考徐孝所‘入聲有長短之別’聽覺感知的進一步證明？

二，如果依照張位《問奇集·各地鄉音》所提出‘官話／鄉音／土語’的概念，並將之區分為‘通語層’與‘方言層’兩個層次，能否進一步解釋漢語語音史與現代方言入聲發展不一致的問題？

三，明代漢語方言入聲可分為幾種類型？其音韻條件為何？

四，明代‘陸路’、‘海路’移民的雙向策略，是否與人聲韻類演變有所關聯？

⁶ 原文：遼東半島，河北省の山東省に接する一部份，濟南や山東半島一部 [213][324][214][313][312] といった降昇調が分布している。陸だけを見れば周辺分布と言えぬことはないが，海を傳っていった可能性が強い。遼寧省の住民の多くは，19世紀初に河北、河南、山東から陸路、海路をつたって來た。陸から入った人人はまず西部に入植し，その後北部やその他の地區に拡がっていった。海から入った人人はまず遼東半島と遼河平原に，その後東部と東南部に拡がっていったという。

2. 方言層次與區域概念的基本設想

本文於方法取徑方面，擬以‘層次’和‘方言區域’兩個概念說明。

如果說‘層次’(Stratum)的原義是‘遺物’或‘遺存’(何大安 2000)。可以暫時借用張光直(1959,1980)兩篇考古學的研究思路，深化‘語言層’與‘方言區域’兩個觀點。

關於‘語言層’的觀點，主要可借用張光直(1959)所提出“母題排隊”的概念重新演繹⁷。所謂“母題排隊”，指稱的是：當‘A、B、C’所指為三種陶器，‘方塊、圓圈、三角形’等分別代表陶器上的形制或花紋，而‘水平位置’指稱陶器所代表的時間層次。依據同一水平位置陶器上的形制，可用以推估其歷史時間的延續。本文根據這個定義，所要提出的想法是：如果將‘A、B、C’所代表的陶器，轉換為‘音韻語料’，方塊等形制花紋為‘音韻現象’，則不同時期音韻語料，若有相近的音韻現象‘會不會只是偶然的’？而這種‘母題排隊’的方法，能否進一步推估語言層中‘原始的音韻類型’？

至於‘方言區域’的觀點，則可再借用張光直(1980)所言及聚落形態研究的兩種主張⁸。倘若將‘聚落形態’改換為方言區域，那麼，張先生所敘述的文字意涵，是很有意思的。具體言之，北方漢語的方言區域，一方面與漢語內部方言區域接壤，另一方面，又與外部不同語族相互接觸，其所形成的“空間性”特徵，提供了觀察語言接觸和方言接觸活動的相關訊息。本文即透過上述的兩個觀點進行分析。

⁷ 原文如次：例如：A 水平有三角形圓圈與方塊，B 水平有三角形圓圈與交叉線，C 水平有三角形交叉線與點，乍看起來，排一條隊容易之至：

A：方塊 --- 圓圈 --- 三角形
 B： 圓圈 --- 三角形 --- 交叉線
 C： 三角形 --- 交叉線 --- 點

但深究起來，這一條隊牽涉到兩個基本的問題：(1) 形式上的相同是不是能代表歷史上的延長？會不會只是偶然的？(2) 假如我們承認它們是歷史上的延長，所使用的單位在 A、B、C 三個水平所代表的社會中，的確都被認為是「單位」，才能把它們相互比較。

⁸ 原文如次：在聚落形態的考古學研究上，有兩種互輔但有尖銳區別的學派。其一可以稱為聚落考古學，強調對聚落居民生活與行為的了解，包括他們與其他聚落之間的關係行為在內。另一派可以稱為空間考古學(Spatialarchaeology)，或位置考古學(locational archaeology)，主要強調“空間性”本身，以自聚落在空間上或位置上的特徵而取得解釋性的模型為目的。

3. 明代北方漢語方言語料音讀形式分析

本文依循張位、陸容所提及的方言區域，將明代北方漢語方言區域整合為五個區域，分別為：一，京師地區，二，河南、梁宋，三，北直隸、山東、齊魯，四，山西、燕趙，五，陝西、秦晉。其次，依張位《問奇集·各地鄉音》、陸容《菽園雜記·卷四》所言及的字例與其中古條件、現代方言的音讀形式，進行對當（correspondence）分析⁹。（必須補充說明的是，本文省略關於方言調值部分的討論，主要取以中古相同調類為條件進行入聲韻類的觀察。）其三，果若方言點缺乏相應的音讀形式，則以‘一’符號表示。其四，張位《問奇集·各地鄉音》以及陸容《菽園雜記·卷四》所載錄的“字例”並未標注任何‘反切’訊息，其表述形式可改寫為“A ≅ B”。符號‘≅’代表‘近似值’，理由在於無論“A為B”或是“以A為B”，究竟僅能取其大概。換言之，本文採取對應廣韻音切取其音韻條件的做法，是否符合張位、陸容兩位作者的‘原意’？便有了持續深論的可能性¹⁰。即便採取《廣韻》音切，仍然存在一個意義與音切關係的問題。以張位和陸容僅列出字例的描寫方式推斷，‘音義關係並存’，抑或‘音讀關係相近’？皆有其可能性。本文採取‘音讀關係相近’的假設，主要仍是依據文獻內部訊息而來。是以，當張位與陸容所取字例，其於《廣韻》內部為兩個以上音切，本文僅抽樣取其一例。

其次，現代漢語方言調查，所依憑的是中古音類的框架，而非為與古文獻語料的聯繫而進行¹¹。在形式分析的過程中，恐怕無法針對所有語料，作出全然有效的對當分析。又，不同的調查團體與其調查區域、材料，時有廣略、繁簡等問題¹²，種種因素很可能會造成文獻語料細部分析的諸多困難（此中仍帶有一個觀念，中古音類概念是建立在音義關係系統下的產物。後起的文獻材料，則又涉及

⁹ 至於調值與音節內部單位的相關問題，將另闢專文討論。

¹⁰ 目前對於明清時期文獻語料的研究方法，研究者多是採取類近‘內部擬構法’（internal reconstruction）的觀念，用以說明文獻內部音類排序後的結構，並依此擬定該文獻的音讀系統。

¹¹ 至於漢語方言調查語料，究竟該以音位或是語音概念進行觀察，很可能是現階段仍有待進一步釐清的問題。

到撰作者方言區域內部，其於不同個體、事物間的認知模式。以數學集合論的概念論之，中古時期音類能否全然‘涵蘊’後起文獻，及其於個別時空環境所衍生的音義系統？尚待細部分析），凡此皆為解讀明代文獻語料相關音韻問題之前，本文有所意識的問題。嚴格說來，明清時期漢語文獻語料的解讀、分析，便需要以更多的前提設想進行多種測試，考量中古音類結構，固然是個檢視的窗口，卻無法說明其必然性。從研究方法的立場進行反思，該種論述策略容易套入制式化的研究框架。理由至少有二：其一，明清時期的漢語方言，其時間間距近於現代而遠於中古。其二，明清時期官方移民政策，或是非官方移民活動（本文暫不考慮‘流民’問題），已然鬆動了中古時期的人口結構。‘人’是語言（方言）的載體，當某種語言（方言）為該族群於特定聚落所使用，其人口銳減、甚至消亡之時，便代表著該語言活動趨於休止進而絕滅。若是研究者依循中古音類，特別是中古後期韻攝的概念進行音讀形式的推論，至少必須假定兩種，甚至兩種以上的檢證程序，用以進行交叉論證。本文透過中古音類條件和現代漢語方言音讀形式，嘗試提出一個暫時性的解釋。

3.1 京師區域

(6)	A. 步薄故：布博故	B. 謝辭夜：卸司夜	C. 鄭直正：正之盛	D. 道徒暗：到都導
1. 北京	pu : pu	ɛie : -	tʂəŋ : tʂəŋ	tau : tau
2. 天津	pu : pu	ɛie : ɛie	tʂəŋ : tʂəŋ	tau : tau
3. 石家莊	pu : pu	siɛ : siɛ	tʂəŋ : tʂəŋ	tau : tau
4. 平山	pu : pu	- : -	tʂəŋ : tʂəŋ	tɔ : tɔ
5. 張家口	p ^h u : pu	ɛie : ɛie	tʂəŋ : tʂəŋ	tao : tao
6. 陽原	pu : pu	ɛie : ɛie	tʂɔ̄ : tʂɔ̄	tɔu : tɔu
7. 昌黎	pu : pu	ɛie : ɛie	tʂəŋ : tʂəŋ	taur : -

¹² 《河北方言概況》(1961: 24) 的群體調查者，曾提出‘記偏旁’的說法，言下之意即是依漢字偏旁相同原則，歸納其音讀形式的記音方法。站在方法論的立場，很可能仍有待更進一步的補苴。

(6) 爲陸容所列京師地區語音呈現對等關係的語料。依中古條件言之，A、B 組的中古區別，在於幫系、精系聲母清濁之別。C 組的區別，在於章、澄二母清濁之別，D 組則是聲母、聲調調類皆有別。次者，若將京師地區的語料對比河北方言附近的十二個方言點：北京、天津、承德、唐山、保定、滄州、石家莊、邯鄲、平山、張家口、陽原、昌黎，可以發現十二個方言點於“步布、謝卸、鄭正、道到”的音讀形式，是相互對稱的，當可證明陸容的聽覺感知，有其合理性，只是陸容所舉京師地區語料的字例，主要集中於去聲、上聲，至於平聲、入聲的音韻問題爲何？必須留待 3.3 節對照於北直隸、山東的語料，方可繼續思考陸容於入聲與平、上、去三調類的合併問題。

3.2 河南、梁宋

(7)	A. 河胡歌：喝呼合	B. 南那含：難奴案	C. 妻七稽：七親吉	D. 弟徒禮：帝都計
1. 開封	xɣ ^{陽平} ：-	nan：nan	te ^h i：te ^h i	ti：-
2. 鄭州	xɣ ^{陽平} ：xɣ	nan：nan	ts ^h i：ts ^h i	ti：-
3. 淮陽	xɣ ^{陽平} ：-	nan：nan	te ^h i：te ^h i	ti：-
4. 洛陽	xə：xə	nã：nã	ts ^h i：ts ^h i	ti：-
5. 安陽	xɣ ^{陽平} ：-	nan：nan	te ^h i：te ^h i	ti：-
6. 信陽	xɣ ^{陽平} ：-	lan：lan	te ^h i：te ^h i	ti：-
7. 獲嘉	xɣ：-	nan：nan	te ^h i：-	ti：ti

陸容所舉(7)河南的四組字例，依據中古音韻條件，以A、C組爲例，就聲調而言，入聲歸於平聲。就聲母而言，曉、匣二母清濁無別。就韻攝而言，果咸，蟹臻合流。B組，則是去聲與平聲合併，咸山攝合流。D組較單純，端、定清濁之別¹³。

次者，(7)字例於《河南方言研究》、《獲嘉方言研究》、《洛陽方言研究》、《鄭州方言志》所載音讀形式，呈現出兩種情況：

¹³ 此處‘合流’一詞，並非歷史語言學所謂‘merger’的觀念。該詞彙在本文的意涵，指稱的是文獻作者於語例音讀的聽覺感知，意即音讀的‘趨近’。

一，(7) 所列舉‘河、喝’在鄭州、洛陽為相同音讀形式¹⁴，‘南難、妻七’於開封、鄭州、商丘、淮陽、洛陽、安陽、信陽、獲嘉等方言點呈現對稱形式。

二，‘弟、帝’於鄭州、獲嘉音讀形式雖同。然則《河南方言研究》(1993: 247) 所採錄安陽‘七’/tɕiʔ/的音讀形式，仍保留喉塞音韻尾。

(8)	1. 安陽	2. 信陽	3. 獲嘉	4. 淮陽	5. 靈寶
A. 都當孤：兜當侯	tu : tou	tu : tou	tu : tou	tu : tou	tou : tou
B. 席祥易：西先稽	ei : ei	ei : ei	ei : ei	ei : ei	ei : ei
C. 墨莫北：昧莫佩	mei : mei	mei : mei	mei : mei	mei : mei	mei : mei
D. 識賞職：時市之 ¹⁵	ʃəʔ ^入 : ʃɿ ^{陽平}	sɿ ^{陰平} : sɿ ^{陽平}	sɿ ^{陰平} : sɿ ^{陽平}	sɿ ^{陰平} : sɿ ^{陽平}	ʃɿ ^{陰平} : ʃɿ ^{陽平}
E. 於央居：俞羊朱	- : -	- : -	y : y	- : -	- : y
F. 肱古弘：公古紅	- : kuŋ	- : koŋ	- : kuŋ	- : kuŋ	- : kuŋ

(8) 為張位所述梁宋區域的字例，B、C、D 組顯示入聲與平聲、去聲合流的現象。簡而言之，此時河南的入聲韻類的歸併方向，提供另一音韻規律的思考，其一，當時梗攝、蟹攝開口可能有一部份已然合流，其二，曾攝則與蟹攝合口、止攝開口字進行歸併。若與(7)比較，陸容所述的字例顯示，咸攝、果攝以及蟹攝、臻攝部份例字已然合流。如果再觀察開封、鄭州、商丘、洛陽、安陽、信陽、獲嘉、淮陽、等處河南方言點的語音形式，可以發現“席西、墨昧、識時”音韻形式的相互對應，而‘都’字本身呈現兩種音讀形式。張位所列字例與河南方言調查材料有所對當 (correspondence)，呈顯出其聽覺感知的可靠性。整合陸容、張位所列出(7)(8)的語料，可以假設當時河南地區，入聲已有部份經由擴散作用 (diffusion) 而與其他韻類合流。

如何證明這個設想？橫田整三 (1938) 對於明代戶口相關研究的資料提供一

¹⁴ 請注意，(7) 所徵引語料，並非同一調查者，在相近時間的取樣資料。許多內部問題，含括同一區域方言報告，不同調查者雖採用相同例字，卻取得不同音讀形式。該如何檢證調查者所記錄的語料？如何可能給予一個客觀的檢證標準與程序？儘管如此，本文仍依據現有的語料，進行最大限度的分析。

¹⁵ 河南內部方言點的對當形式，尚有開封、鄭州、商丘、：ʃɿ^{陰平} : ʃɿ^{陽平}；洛陽 ʃɿ^{陰平} : sɿ^{陽平}。

個可能的思考路徑，橫田先生談到：

(9) 湖廣及び河南地方は、地理学上の所謂團塊形態を有する支那部の中心に當つてゐる。従つて其の位置の為に四邊との交通の要衝に當り、曾ては殷盛を極めた地方であつた。さて上來各省の戸口移動に就いて述べ、其中江西南直隸方面よりは少しく、北直隸山東殊に山西陝西方面よりは多くの人口が此方面に流入した事は折に觸れて述べた所である。

(9) 的大意是，湖廣和河南作為中國的地理要衝，各省區居民交通往來頻繁，尤其是北直隸、山東人口較山西、陝西為多，換言之，接下來必須進一步證明北直隸山東地區入聲的相關問題。

3.3 北直隸山東、齊魯

在前文論及(6)京師地區的語料時，曾述及需仔細注意陸容所言：“北直隸山東人以屋為烏，以陸為路，以閤為杲，無入聲韻；入聲內以緝為妻，以葉為夜，以甲為賈，無合口字。”本文依此段文字，暫時假定陸容將入聲分為兩個層次，一者已和平、上、去聲韻類合流，一者則仍保留入聲的性質。

(10)	1. 煙臺	2. 博山	3. 濟南	4. 濟寧	5. 石家莊	6. 平山	7. 張家口	8. 陽原
A. 屋烏殺：烏哀都	u : u	vu : vu	u : u	u : u	vu : vu	vu : vu	- : vu	vəʔ : vu
B. 陸力竹：路洛故	lu : lu	lu : lu	lu : lu	lu : lu	lu : lu	lu : lu	- : lu	luəʔ : -
C. 閤古落：杲古老	kuo : -	kuə : kə	kə : -	kə : -	ky : -	kə : -	- : -	kaʔ : -

在分析陸容所提出六組對比字之前，必須提出兩個問題：為什麼陸容將京師與北直隸分開討論？又，為什麼北直隸與山東合在一起討論？針對第一個問題，也許可以設想為，京師指的是今‘北京城區’，而北直隸可以概括整個河北方言。至於第二個問題，可以設想為陸容將‘河北、山東’歸為一方言區。值得特別注

意的是，A、B、C 組指的是入聲失落而歸併，D、E、F 組則是認為入聲調類仍保存，換言之，當時的入聲應該分為兩個層次。

表（10）1~4，博山方言相較顯得特殊，‘屋’、‘烏’帶有/v-/聲母（根據錢曾怡（1993：22）所描述的內容：“v 在 u 韻母的前面有時自成音節，vu 的實際音值是 [y]，有時則是 [w]”，本文擇以音位觀點呈現），而‘閣’、‘杲’呈現出母音 /-ə-/：/-ɔ-/ 前後之別。從中古的條件看來，A、B 組的入聲字例，顯示通、遇兩攝部份合流。但是，入聲宕攝字、上聲效攝字韻類雖趨向歸併，仍因“元音前後”形成兩個層次的區野。

表（10）5~8，石家莊、張家口、陽原三處‘屋’、‘烏’亦皆有帶/v-/聲母，陽原的‘屋’、‘烏’母音形式則為 /-ə-/：/-u-/ “母音高低”。至於‘陸’、‘路’則呈現相互對應情況。以下，對照時間為早《河北方言概況》所記錄入聲字‘屋’、‘陸’、‘閣’的音讀形式：

(10.1)		1. 肅寧縣	2. 魏縣	3. 邢臺縣	4. 成安縣	5. 涉縣	6. 赤誠縣	7. 張北縣	8. 萬全縣
A. 屋烏穀	-	u/ue	-	uə?	-	-	-	-	uə?
B. 陸力竹	-	-	-	luə?/li	luə?/li	-	-	-	lə?
C. 閣古落	kx/kau	-	kə?	kə?	kʌ?	kə?	kə?	kə?	kʌ?

在魏縣、成安縣、萬全縣，‘屋’與河北其他方言點‘烏’的音讀形式呈現 /-ə-/：/-u-/ 前後之別，而成安縣、涉縣、萬全縣‘陸、路’的形式則為 /-ə-/：/-ou-/ 與 /-u-/ 前後的區別，而‘閣’字在肅寧、邢臺、成安、涉縣、赤誠、張北縣、萬全縣則有 /-ʌ-/：/-ə-/：/-au-/：/-ɻ-/ 四類元音形式。按照陸容的說法，這三組字在當時可能已趨近歸併，只是入聲韻類與其相對應的平聲、上聲、去聲之間，仍因主要元音的‘前後、高低’而有所區別。

(10.2)	1. 煙臺	2. 博山	3. 利津	4. 莒縣	5. 牟平	6. 濟南	7. 青島	8. 濟寧
D. 緝七入：妻七稽	- : tɕʰi	tɕʰi : tɕʰi	tʂʰi : tʂʰi	tʂʰi : tʂʰi	- : tɕʰi	- : tɕʰi	- : tʂʰi	- : tɕʰi
E. 葉與涉：夜羊謝	ie : ie	io : io	io : io	ie : ie	io : io	ie : ie	io : io	io : io
F. 甲古狎：賈古疋	cia : cia	teia : teia	teia : teia	teia : teia	cia : cia	teia : teia	teia : teia	teia : teia

煙臺、博山、利津、莒縣中的“緝、妻、葉、夜、甲、賈”確實如陸容所言無‘合口字’，但是，進一步的問題是（10.2）山東省方言點的音讀形式，無法判讀“入聲／平聲”之別，那麼，陸容所言“入聲內以緝爲妻，以葉爲夜，以甲爲賈，無合口字”究竟是否能站得住腳？需再觀察（10.3）的材料：

(10.3)	1. 北京	2. 天津	3. 承德	4. 唐山	5. 保定	6. 石家莊	7. 張家口	8. 陽原
D. 緝七入：妻七稽	- : tɕʰi	- : tɕʰi	- : tɕʰi	- : tɕʰi	- : tɕʰi	- : tʂʰi	- : tɕʰi	tɕʰioʔ : tɕʰi
E. 葉與涉：夜羊謝	ie : ie	ie : ie	ie : ie	ie : ie	ie : ie	ie : ie	- : ie	- : ie
F. 甲古狎：賈古疋	teia : teia	teia : teia	teia : teia	teia : teia	teia : teia	teia : teia	- : teia	teiaʔ : -

除了陽原一處‘緝’、‘妻’呈現元音 /-ə-/ : /-i-/ 低之別外，‘葉夜、甲賈’的語音形式皆是相互對稱的局面。檢視《河北方言概況》載錄的音讀形式：

(10.4)	1. 邢臺縣	2. 成安縣	3. 涉縣	4. 張北縣	5. 萬全縣
D. 緝七入	-	-	tɕʰioʔ	tɕʰioʔ	tɕʰioʔ
E. 葉與涉	-	-	ie	ioʔ	iʌʔ
F. 甲古狎	teio / teioʔ	teioʔ	teiʌʔ	teiʌʔ	teiʌʔ

透過（10.4）可以發現，“緝／妻、葉／夜、甲／賈”這三組“前入聲／後非入聲”的音韻徵性，很可能仍是在於“元音前後、高低”的條件項下形成的。如何詮解陸容於入聲兩層次的聽覺感知？《河北方言概況》（1961：50-56）所提出的說解，有助於討論這個問題，請看（11）：

(11)

a. 邯鄲專區、張家口專區的人聲就比較短促，只有石家莊專區的人聲不太短促。

b. 由於入聲字的主要母音不同。大體上分爲 a、ia、ua、üa (或 aʔ、iaʔ、uaʔ、üaʔ) e、ie、ue、üe (或 eʔ、ieʔ、ueʔ、üeʔ) 這兩套，但各地不一定這兩套都有，有的有一套，有的是殘缺不全。有的人聲字在一部分地區已經消失，另一部份人還念入聲字，甚至念不念入聲字兩可了，這是入聲字正在演變的必然現象。

從這段描述中，可以得知前引文(4)所言及入聲韻母‘短促’與‘不太短促’的區別，實際上應該是元音的高低問題。至於徐孝所謂‘入聲亦有隱互于平聲’的說法，指的當是濁入‘匣’與濁平‘霞’因元音相同，加以‘匣’韻尾/-p/失落而歸并的情況。至於‘詩人忽略於長短之別’，則是‘濁入’中‘匣、石’所呈現“/-ε-/：/-a-/”母音高低的對比。進一步而言，‘濁入聲’可分爲兩個層次，一部分朝向與‘濁平聲’歸并，一部份仍然保持入聲的音韻徵性，而徐孝所謂的‘長短之別’，即是歸并的‘條件項’，亦即‘元音的高低’問題，是以當時一部份入聲字混併于平聲字中，另一部份所存在的入聲字仍以喉塞音收尾。這樣的解釋，可以進一步理解徐孝所謂“添通用時俗之音，并無刪削入聲之說”的說法，換言之，本文據此來大膽推斷徐孝的入聲長短之說，具體情況亦當是“元音位置的高低”所造成的聽覺感知，徐孝的說法和方言調查報告所呈現的現象，也就有了接軌的基礎。

必須再加以說明的是，果若進行歷時性 (diachronic) 的觀察，明代‘元音高低’的現象是否可能是受到元代蒙古語長元音的影響？這一點可由八思巴文文字拼切規則，尋繹出可能的解釋方向。八思巴文具有‘陰性’、‘陽性’及‘中性’三類元音，若與現代蒙文進行比較，可以得出不同的拼合規則，照那斯圖先生稱之為‘元音搭配律’。此外，元代是否已形成長元音，目前學界多依從服部四郎先生的看法，分爲‘原始長元音’以及‘再生長元音’兩類 (這個論斷的依據來自元代的‘漢語借詞’)。至於本文依據《河北方言概況》所描寫的音韻行爲

(phonological behavior)，用以解釋徐孝所描述明代北京區域，其長入、短入的入聲韻類現象。然則，究竟這種現象是受到何種蒙古語‘長元音’的影響？抑或是當時漢語內部方言接觸，所產生的新變體？僅能暫時存疑。

重新回到陸容的語料問題，則其所列入聲可能有兩個層次的語料很可能是反映當時北直隸的語音問題，至於入聲和平、上、去三調類合併後音韻趨同的情況，則可能是當時山東方言部分區域的音韻現象。但是，陸容所觀察的語料很可能是不足的，或許只是反映部分入聲韻類的問題，為什麼？

(12)	1. 煙臺	2. 博山	3. 利津	4. 莒縣	5. 青島	6. 諸城	7. 濟寧	8. 牟平
A. 北博黑：彼甫委	po : pei	pei : pi	pei : -	pei : pi	pei : -	pei : -	pei : pei	po : pi
B. 國古或：詭過委	kuo : -	kuei : kuei	kuo : -	kux : kuei	kuo : -	kuo : kuei	kuo : kuei	kuo : kuei
C. 或胡國：回戶恢	xuo : xui	xuei : xuei	- : -	- : xuei	xuo : xuei	xuo : xuei	xuo : xuei	xuo : xuei
D. 狄徒歷：低都奚	ti : ti	ti : ti	ti : ti	ti : ti	ti : ti	ti : ti	ti : ti	ti : ti
E. 麥莫獲：賣莫懈	mo : mae	mei : me	mei : me	mei : mai	mei : me	mei : me	mei : me	mo : mai
F. 不分勿：補博故	pu : pu	pu : pu	pu : pu	pu : pu	pu : pu	pu : pu	pu : pu	pu : pu

(12) 的中古條件顯示張位依然注意到入聲字與其他調類的歸併情況，可有三點：其一，曾攝與止攝、蟹攝的歸併，其二，梗攝、蟹攝的合流，其三，臻攝、遇攝的合流。各方言點的音讀形式顯示：一，‘北、彼’在濟南、濟寧兩個方言點，音節內部聲類、韻類和調類，恐怕已全然合流。但是，煙臺、博山、莒縣、牟平仍保持元音差異。二，‘國、詭’、‘或、回’、‘麥、賣’在山東地區，仍處於不平衡的合流，亦即依然存在元音差別屬性。惟獨‘狄、低’、‘不、補’兩組，除了調值的可能差異外，入聲韻類確已失去喉塞尾。三，若就中古條件看來，曾攝與止攝、蟹攝，或梗攝與蟹攝的合流趨向，卻形成元音的高低、前後不同層次的‘方言層’關係，是以《河北方言概況》所述入聲‘短促、不短促的區別’很可能亦適用(12)於張位所列舉齊魯地區入聲韻類問題。申論至此，可以發現如果將河北、山東地區入聲分為兩個層次，何以能夠解釋入聲合流層次的部分？考量橫田整三(1938)先生所言山東、北直隸人口移入河南，造成河南地區入聲

韻類層次結構的變動，或許便有其可能性。以下，繼續思索與河北鄰近而成平行的區域－山西。

3.4 山西、燕趙

關於陸容和張位於山西、燕趙語料，其與現代山西方言的對當形式如次：

(13)	1. 吉縣	2. 山陰	3. 汾西	4. 屯留	5. 沁縣	6. 運城	7. 武鄉	8. 天鎮
A. 同徒紅	t ^h uəŋ	t ^h uδ	t ^h uəŋ	t ^h uəŋ	t ^h uəŋ	t ^h uŋ	t ^h uaŋ	t ^h uɿŋ
屯徒渾	t ^h uei	t ^h uδ	t ^h uəŋ	-	t ^h uəŋ	t ^h uei	t ^h uaŋ	t ^h uɿŋ
B. 聰倉紅	ts ^h uəŋ	ts ^h uδ	ts ^h uəŋ	ts ^h uəŋ	ts ^h uəŋ	ts ^h uŋ	ts ^h uaŋ	ts ^h uɿŋ
村此尊	ts ^h uei	ts ^h uδ	ts ^h uəŋ	-	ts ^h uəŋ	tɕ ^h yei	ts ^h uaŋ	ts ^h uɿŋ
C. 無東韻								

以陸容於(13)所舉字例，顯示的是中古‘通’、‘臻’二攝合流的情況。但是，‘同屯’、‘聰村’二組字在‘吉縣、永濟、運城’仍為不同音讀，至於‘無東韻’的說法，若再參照《山西方言調查研究報告》的相關內容，可以發現太原、武鄉、大同、山陰、寧武呈現中古‘通、臻、梗’三攝合流的情況。單純思考(13)語例的中古條件，可能無法有效掌握該現象的實質意義。然若考量到《等韻圖經》‘通攝開口’，其於《四聲領率譜》所載反切語料，其反切下字的中古來源清一色為‘梗、曾’二攝。這種音類關係的重組現象，表示有明時期河北、山西‘通攝、梗攝’部分音讀已趨合流。何以漢語兩個區域鄰近方言，在同一時期具有相近的音韻歸併方向？請先觀察(14)：

(14)	1. 吉縣	2. 清徐	3. 山陰	4. 沁縣	5. 屯留	6. 介休	7. 朔縣	8. 新絳
A. 坐祖果	ts ^h uo	tsuɿtu	tsuə	tsuo	tsuo	tey _E ¹⁶	tsuə	ts ^h uə
劉羸卧	-	-	-	ts ^h uo	ts ^h uo	-	ts ^h uə	ts ^h uə
B. 青倉經	-	te ^h iɿ	te ^h iɿ̄	te ^h iŋ	te ^h iŋ	ts ^h ei	te ^h ɿ̄	ts ^h ie 白/ts ^h iəŋ 文
妻七稽	te ^h i	-	te ^h i	ts ^h i	te ^h i	ts ^h ei	te ^h i	te ^h i

(14) 陸容所列‘坐、劉’兩字，在山西原平、大同、忻州、沁縣、屯留、朔縣則為‘不送氣/送氣’的區別，至於‘青、妻’二字的音讀形式，其於上列的山西方言點看來，顯然仍有所區野。換言之，中古梗、蟹二攝在該區域尚未合流。值得注意的是，張位所列‘燕趙’一區語料，其中古條件屬於入聲和平上去聲韻類的問題，反映出當時山西、河北、山東入聲韻類，可能因方言接觸頻繁，從而引起張位的特別關注，請先看(15)：

(15)	1. 文水	2. 武鄉	3. 朔縣	4. 孟縣	5. 沁縣	6. 屯留	7. 山陰	8. 忻州
A. 北博黑：卑府移	pioʔ : pe	pioʔ : pei	pioʔ : pei	pixʔ : -	pioʔ : pei	pəʔ : pi	pioʔ : pei	pioʔ : pei
B. 綠力玉：慮良	- : ly	lyəʔ : -	tuəʔ : ly	luxʔ : ly	lyəʔ : -	lyəʔ : ly	lyəʔ : ly	luəʔ : ly
C. 六力竹：溜力救	luəʔ : ti	luəʔ : -	liəu : li	luxʔ : li	li : li	luəʔ : li	liəu : li	li : li
D. 色所力：篩山佳	saʔ : -	səʔ : -	saʔ : se	sAʔ : sæ	səʔ : sɛ	səʔ : sæ	saʔ : see	səʔ : sæ
E. 飯符萬：放甫妄	xuaŋ : xuaŋ	fæ : fɿ̄	fæ : -	fā : fuo	fān : fɿ̄	fān : fəŋ	fæ : fə	fā : fā
F. 粥之六	-	-	tʂəu	-	tsəuʔ	tsəuʔ	tʂəu	tʂəu
周職流	tsou	tsəu	tʂəu	tsəu	tsəu	tsəu	tʂəu	tʂəu
G. 霍虛郭	xuəʔ	-	xuəʔ	xuəʔ	xuAʔ	xuəʔ	xuəʔ	xuəʔ
火呼果	-	xuɿ	-	-	xuo	xo	xuə	xue
H. 銀語巾：音於金	- : iəŋ	- : -	iə̄ : iə̄	iə̄ : iə̄	iŋ : iŋ	in : in	- : iə̄	iəŋ : iəŋ
I. 谷古祿：孤古胡	- : ku	kuəʔ : ku	kuəʔ : ku	kuɿʔ : ku	kuəʔ : ku	kuəʔ : ku	ku : ku	kuəʔ : -

¹⁶ 依據《山西方言調查研究報告》(1993: 401-407)於平遙、孝義、介休等語音行爲的描述內容：“E的實際音值爲[ɿ̄]，只拼 tʂ tʂ^h ʂ ʂ^h 四個聲母”。次者，《河南方言研究》(1993: 125)於商邱方言韻母的描寫，提到相近的語音形式：“ae 中的 E 是介於標準元音 e 和 ɛ 之間的一個元音，比 e 開些、鬆些，比 ɛ 鬆些、閉些”。根據兩方言報告內容，顯示‘語音形式’與‘實際音值’並非等同關係。至於不同方言區域音讀的‘符號形式’相同，是否即代表兩方言‘實際音值’等同？仍有待實驗語音學的驗證。

(15) 除了‘飯、放’、‘銀、音’兩組字外，其他七組字都是入聲與非入聲的對應。山西方言點的入聲字‘北、綠、六、色、粥、霍、穀’在“中陽、文水、武鄉、朔縣、沁縣、介休、屯留、清徐、原平、忻州”皆保留喉塞音韻尾，張位所列的這七組字顯示當時入聲除了前面所分析喉塞音韻尾消失，而以元音前後、高低作為區別徵性的一個層次外，另外，當時仍有一個層次是保留喉塞音韻尾。關於入聲仍保有喉塞音韻尾的問題，可再對照(16)：

(16)	1. 北京	2. 承德	3. 唐山	4. 保定	5. 邯鄲	6. 平山	7. 張家口	8. 陽原
A. 北博黑：卑府移	pei : pei	pei : pei	pei : pei	pei : pei	pieʔ : pei	- : pæ	pio : pei	pioʔ : pi
B. 綠力玉：慮良	ly : ly	ly : ly	ly : ly	ly : ly	lyeʔ : ly	li : li	luəʔ : ly	luəʔ : ly
C. 六力竹：溜力救	liou : li	liou : li	liou : li	liou : li	liəu : li	liaɔ : liaɔ	- : li	liu : li
D. 色所力：篩山佳	sɿ : ʂai	sɿ : ʂai	sɿ : ʂai	sɿ : ʂai	sɿ : ʂai	ʂɿ : ʂai	sə : sei	ca : ʂei
E. 飯符萬：放甫妄	fan : faŋ	fan : faŋ	fan : faŋ	fan : faŋ	fan : faŋ	fæ : faŋ	fɛ̃ : fæ	fɛ : fɔ
F. 粥之六	tʂou	tʂou	tʂou	tʂou	tʂou	tʂaɔ	-	tʂiəu
周職流	tʂou	tʂou	tʂou	tʂou	tʂou	tʂaɔ	tʂəu	tʂiəu
G. 霍虛郭	xuo	xuo	xuo	xuo	xuə	xuo	xuəʔ	xuəʔ
火呼果	xuo	xuo	xuo	xuo	xuo	xuo	xuo	xuo
H. 銀語巾：音於金	in : in	in : in	in : in	in : in	iəŋ : iəŋ	iŋ : iŋ	iŋ : iŋ	iɔ̃ : iɔ̃
I. 谷古祿：孤古胡	ku : ku	ku : ku	ku : ku	ku : ku	kuəʔ : ku	ku : ku	kuəʔ : ku	kuəʔ : ku

入聲字‘北、綠、色、霍、穀’在今日河北邯鄲、張家口、陽原，仍保有喉塞音韻尾，這些語料的對當分析是有意義的，加以前文的山西、河北、山東的入聲問題的討論外，本文認為明代河北、山西、山東的入聲可分為兩個層次，應該是可以成立的推論。必須加以討論的是橋本萬太郎(1981)先生所言及的一段長文，徵引如下(17)：

(17)

「北方夷族」侵入という外因をかながえない言語史家は、この「変化」を説

明するために、唐末から、音節末の閉鎖音が「弱まった」として、たとえば：CVp > CVP > CV のように、この P をちいさく書いて、その消失の中間段階しめしたり、

CVp CVt
CVt CV? > CV
CVk > CVk

のような、併合のあとをたどって、その「説明」しようとしている。じじつ、そのような方言もあったことは、たしかで、この CVt : CVk の段階をへたかどうかは、たしかめようがないが、現代山西方言には、まだこの声門閉鎖音の末尾音をたもっている方言が、おおくみられる。

橋本先生主要是認爲：其一，北方蠻族的移入是需要考量的，而歷來的研究者，僅只說明唐代以來入聲塞音尾的弱化，其二，山西方言喉塞音韻尾仍然大量可見，這一點並沒有解釋。具體而言，根據 3.1 ~ 3.4 的討論，本文認爲明代山東、河北、山西、河南地區的漢語方言入聲層次可爲兩類。而這兩種類型，與其他韻類歸併的音韻條件則在於“主要元音的高低、前後”，如（18）所示：

（18）明代山西、河北、山東、河南的入聲層次

- A. 入聲韻尾全然失落 _____（受通語層影響）
B. 入聲韻尾仍帶 -ʔ 尾 _____（可分爲兩種類型）

3.5 陝西、秦晉

陸容、張位於陝西、秦晉所記錄的相關語料，請先思考（19）：

(19)	1. 白河	2. 漢中	3. 寶雞	4. 綏德	5. 商縣
A. 鹽余廉：年奴顛	ian : ian	ian : nian	iã : iã	- : nie	ian : -
B. 咬五巧：裏奴鳥	iau : iau	niau : niau	io : io	niau : niau	niao : -

《廣韻》‘裏 奴鳥切’，‘咬’、‘鳥’同音的情況，可以證之於陝西白河、漢中、西安、寶雞、綏德五個方言點，至於‘鹽’、‘年’若為同音，則‘年’的聲母恐怕已失落。相對設想，以陝西人的聽覺感知進行推測，其於舌尖音、舌尖面音的發音方法，舌位動作於口腔內部所產生的摩擦作用，可能較為輕微，是以聽覺感知便呈現若有似無的狀態。

(20)	1. 白河	2. 漢中	3. 西安	4. 寶雞	5. 綏德	6. 商縣	7. 銀川	8. 敦煌
A. 紅戶公	xuŋ	xuŋ	xuoŋ	xuəŋ	xuŋ	xuəŋ	xuŋ	xuð
魂戶昆	xuən	xuən	-	xuəŋ	xuŋ	xuən	xuŋ	xuð
B. 國古或：歸舉韋	kuə : kuei	kuo : -	- : kuei	- : kuei	kuo : kuei	kuei : kuei	kuə : kuei	kuə : kuei
C. 數所短：樹常句	- : -	su : su	fɨ : fɨ	- : -	- : -	sou : su	su : ʂu	ʂu : ʂu
D. 百博陌：撇普蔑	pei : p ^h ie	pei : p ^h ie	pei : p ^h ie	pei : p ^h ie	pie : p ^h ie	pei : p ^h ie	pia : p ^h io	- : p ^h io
E. 東德紅	təŋ	tuŋ	tuəŋ	tuəŋ	tuŋ	tuəŋ	tuŋ	tuð
敦都昆	-	tuən	tuē	tuəŋ	tuŋ	tuən	tuŋ	tuð
F. 中陟弓：朧章倫	tʂuŋ : -	tʂuŋ : -	pfəŋ : -	- : -	tʂuŋ : -	tsuəŋ : -	tʂuŋ : -	tʂuð : -

(20) A、E、F 組字所顯示的中古條件是‘通臻’合流。值得注意的是，陸容所列山西方言語料，亦為‘通臻’合流。兩處語料訊息的一致性恐非偶然為之，本文據以設想明代陝西、山西、河北，很可能同時經歷過‘通、臻’合流的規律¹⁷。次者，B、D 組‘國歸、百撇’入聲和非入聲之間，仍與前文所言及元音高低、前後的辨音徵性相當。換言之，根據張位、陸容的說法，入聲韻類仍是一部份與平、上、去合流，並非全然失去與平、上、去聲韻類的區別。從前文 3.1 至 3.5 的討論中可以發現，若以‘入近三聲’來思考元明時期文獻的問題，或者進

¹⁷ 至於是‘共同存古’抑或‘共同創新’？則已超出本文所能論述的範圍。

一步思考有明以至於現代的方音問題，應該都是比較能夠解釋入聲的實質問題。

重新整理歸納 3.1~3.5 中古聲類、韻韻和調類的分析，可如（21）所示：

(21)	1. 聲母	2. 韻母	3. 聲調
A. 京師地區	a: 幫 = 定; 心 = 邪 端 = 定; 知 = 章	-	-
B. 河南梁宋地區	a: 心 = 邪; 書 = 禪 曉 = 匣 b: 端 = 定	a. 果山咸攝合流 b. 蟹臻; 流遇; 曾通; 梗曾攝合流	入 ≥ 平 入 ≥ 去
C. 北直隸山東齊魯	a: - b: 端 = 定; 幫 = 非	a. 通遇; 宕效; 深蟹; 咸假合流 b. 曾止蟹; 梗蟹; 臻遇合流	入 ≥ 平上去 入 ≥ 平上去
D. 山西燕趙	a: - b: 非 = 奉	a. 通臻合流 b. 曾止; 通遇; 通流 ; 宕果; 臻深; 曾蟹 ; 山宕合流	入 ≥ 平上去
E. 陝西秦晉	a: - b: 知 = 章; 幫 = 滂	a. 山咸合流 b. 通臻; 曾止; 梗山合流	入 ≥ 平

4. 明代北方漢語方言入聲韻類相關的歷史問題

橫田整三（1938）先生亦曾提出（22）的問題：

（22）

明代の戸口が、その推移に独り特異なるな見るは、其処に何等かの深い理由が存するとしなければならぬ、而してその移動の特質は如何なる點で歴代と異り、又如何なる點で歴代と共通せる様相をもったのであらうか？

（22）の問題意識，曾經影響本文作者對於明代移民史料的關注。值得一提的是，徐泓（1980）則是由‘移徙政策’接入明代南京都城規劃的相關議題，其中，經由幾個層面的論證後，提出明代關於南京城相關問題中，值得信賴而可以應用的材料：

(23)

a.《明太祖實錄》，洪武四年閏三月庚午條：南京城內外戶數共二萬七千一百九十五戶，其中民戶二萬一千五百六十七，軍一千八百九十六，公侯族屬一千一百九十七，官吏二千四百九十九。b.《明太祖實錄》，洪武二十四年七月庚子條：徙五千三百富民至京師。c.《明太祖實錄》，洪武二十八年一月甲子條：移直隸蘇州等十七府州及浙江等六布政司小民二萬戶赴京，充倉腳夫。d.據《萬曆上元縣志》、《正德江寧縣志》所載修正推算出的坊廂戶口數，坊一百一十六、廂一百三十八點五、裏三七十二點五、戶六萬五千九百、口四十七萬三千二百。e.《明太祖實錄》，洪武二十九年三月戊辰條：在京軍士二十二萬二千餘人。

關於(23 a. e.)兩點‘衛軍’的來源問題，于志嘉(1993)先生曾由‘族譜’進行推論，認為‘京衛軍的來源非常複雜’，只是若順著徐泓先生的引證，‘南京土人的人口數’已不及江浙富民、倉腳夫等移入南京的人口。即便假設‘南京土人’仍是明成祖移往北京的人口主力，還是必須面對明太祖、明成祖初年因為‘移徙政策’首先執行的‘山西移民’的史料。本文的想法是，‘山西移民’的時間早於‘南京移民’，是以其於河北、山東的影響，可能較諸南京移民為深。次者，‘南京移民’的實質意涵應當是‘江淮區域的移民’。具體而言，依據《明太祖實錄》、《明英宗實錄》、《明史》的材料，‘山西移民’向東、向南、向西的移動，可視為第一個階段方言層的搭接。至於‘江淮移民’方言層的移動，則屬第二個階段方言層的植被，由於江淮移民人口結構相較複雜，使得其影響層面、範圍便相對深廣。倘若重新考量本文的基底假設“語言邏輯不等於歷史邏輯”，則此兩階段的移民問題，究竟與明清時期文獻語料的具體聯繫為何？其細節末枝仍有待更深微的探究。

值得注意的是，單純由‘陸路’思考移民方向，恐怕是相當不足的。如何由海路進一步思考移民問題與音韻的聯繫性？本文認為，吳緝華(1956)、(1958)提供出兩條有意義的思路：

一，海運的補給，主要是元末明初，北方仍然爭戰不休，為供給軍糧、戰備物資而起。

二，明成祖永樂年間所構築完成的‘會通河’，是一條足以聯貫‘北京’和‘南京’的大運河，糧食、物資賴此運河輸送的比例，顯然要比明太祖時期單純由海運，由江浙向北京地區運補要來得高。

綜合上述的說法，明代的移徙政策主要是以鄰近‘京師’的省份，作為充實京師人口來源的依據，而明成祖四年‘海路兼運’的策略，勢必亦帶動大規模的江浙等南方各省的人口向北方移徙。或許，在前文所討論五個方言區中，3.2節關於入聲字朝向其他韻類、調類的歸併情況，與明代南北方人口大規模陸路、海路移動有著密切的關係。

需要補充的是，橋本（1981）先生亦言及洪武年間海路移民的相關問題，如下引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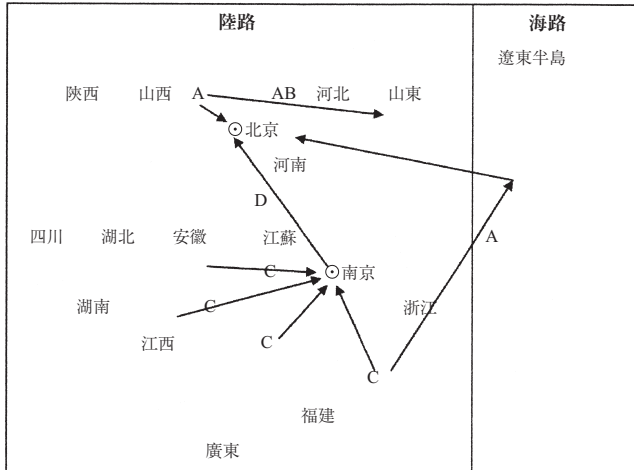
（24）

近代以前の琉球国に、対岸の中国から、相当数の住民が流入したことは、よく知られており、そのことと、いまここに問題としている「地域特徴」の発生とは、けっして無関係に、かんがえられないからである。移住民の流入は、正史にもみえていて、慶安庚寅（一六五〇）、向象賢撰になる『琉球国中山鑑』の巻2には、たとえば、「洪武25年【一三九二】に閩人36姓の移住があり、いまの久米村の住人は、その後胤である。ただ、姓といっても、のちにおところえて、現存するのは、わずかに、蔡と鄭と林と梁と金の5家だけである」

具體而言，依據1650年向象賢“琉球國中山鑑”的記載，當時約略有閩南36姓的居民移住琉球，今日只剩5姓左右，進一步而言，明代的海路移民問題恐怕亦不是單純由太祖或成祖時期‘海陸兼運’政策所可概括。假若再將明清時代的移民問題的相關研究作一整合，諸如橫田整三（1938）、吳緝華（1956，1958）、全漢昇、王業鍵（1961）、徐泓（1980，1982，1988）、于志嘉（1989，

1993)，可以（25）說明明代陸路、海路移民問題，及其對於音韻問題的影響，請看（25）：

（25）



明代陸路、海路移民示意圖，可依‘A、B、C、D’序列分為四個時間層次：A部分是明太祖年間山西移民的路向以及江浙一帶海運向北的航向，B部分是明成祖年間山西移民的情況，C則是‘江浙各省’填實南京的路向，而成祖亦依賴會通河（運河）、和海運向北京運補，D代表遷都所移徙的‘南京移民’（實質應為‘江浙諸省移民’）。

5. 結語

本文經由以上的論證過程，得出以下三點想法：

第一，處於明代不同區域的學者：徐孝、陸容、張位三先生分別記錄當時漢語方言的個別音韻材料，經由《廣韻》音類與現代漢語方言的對當分析，三位先生的思路概略集中於‘入聲韻類’的問題。其中尤以徐孝所提及入聲‘長入、短

入’的分判最值得深入探究。歸納照那斯圖先生以及服部四郎、栗林均兩先生的研究成果，可以進一步補充八思巴文、蒙古文當中長元音、元音和諧等問題：

一，關於阿爾泰語系長元音的問題，在現代蒙古語族中，土族語具有長元音，東鄉語則無，且無元音和諧現象，主要因素是詞位發生變化。另外，蒙古語族的某些現代方言，元音和諧現象消失的原因則可有兩點：一者為詞幹形式縮短，一者是受到漢語的影響。至於八思巴文、蒙文、漢字元音和諧的情況可能不同。

二，前引栗林均（1984）的說法外，事實上栗林先生（1984）於蒙古語母音縮和現象的論證，可再分為兩個層面：

其一，由現代蒙古語方言進行推測，並以其（1982）所論“第1音節の母音iが保存された形が対応している”的結果，檢討過去幾位德、俄學者的說法，其中一例即以A、B和C三規律說明長元音的形成問題，如下：

(26)

A. ‘iの折れ’：i→o/ __ Cō

B. ‘脱円唇化’：ō→ā/ 第2音節以降で

C. *uyā→ō

$\begin{matrix} \nearrow \text{ō} \\ \searrow \text{ā (脱・円唇化)} \end{matri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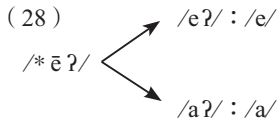
其二，上述的兩種規律，並未將13-14世紀的漢字、八思巴蒙古語全都考慮進去，所以再加入這幾項資料之後，提出母音縮合為長元音的四例：

(27)

A：*uḡa→ā B：*üḡe→ē C：*oḡa→ō D：*ōḡe→ō

第二，根據《河北方言概況》所述入聲字的兩套母音 a、ia、ua、üa（或 aʔ、iaʔ、uaʔ、üaʔ）e、ie、ue、üe（或 eʔ、ieʔ、ueʔ、üeʔ），設想受到蒙古語影響的

明代北京地區，其入聲韻可能的長母音形式爲 * $\bar{e}?$ ，其演變方向可以如下：



本文提出這個構擬，對於思考入聲韻類曾經經歷長元音階段，以至於在明代、現代漢語方言，呈現元音‘高低’和‘前後’的邏輯順序，可望獲得語料及理論層面的雙重解釋。換言之，依據本文的分析，明代入聲可以分爲兩個層次，三種類型。“兩個層次”指的是“通語層/方言層”，“三種類型”可以ABC示之，A：是指受通語層影響，入聲性質全然消失，而與陰聲韻、陽聲韻全然合流的類型；B：是漢語方言本身受到明代山西、江浙移民影響，呈現元音高低、前後の入聲類型；C：是明代北京地區或者更大區域而受蒙古語族影響，具有長元音階段の入聲類型。

第三，明代初年太祖、成祖‘移徙政策’首先帶動‘山西移民’填充河北、山東、河南諸省。次者，太祖因北方外族動亂而由海運補給，成祖雖承其後，不過永樂年間所開通‘會通河’，一條足以連貫北京、南京的大運河，促使大規模江浙移民的北向發展。具體而言，除了北方蒙古語族的影響外，明代實則經歷“山西和江浙移民の入聲擴散運動”。

【附記】本文主要是根據筆者於2007年所宣讀過的論文〈明代北方漢語方言音韻問題的初步觀察—漢語與八思巴文、蒙古文整合研究的思考策略〉修改而成。

參 考 文 獻

- 横田整三 1938 〈明代に於ける戸口の移動現象に就いて〉(上)(下),《東洋學報》第 26 卷第 1 号。
- 服部四郎 1975 〈母音調和と中期朝鮮語の母音体系〉,《言語の科學》第 6 号。
 ———— 1986 《服部四郎論文集》,三省堂。
- 橋本萬太郎 1976 〈晉語諸方言の比較研究〉,《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第 12 號。
 ———— 1972 《現代言語學の基礎》,大修館書店。
 ———— 1978 《言語類型地理論》,弘文堂。
 ———— 1980 《現代博言学》,大修館。
- 栗林均 1982 〈蒙古語史における「i の折れ」の問題点〉,《言語研究》第 82 号, p29-47。
 ———— 1984 〈蒙古語における *uʏa と *üge の母音縮合〉,《言語研究》第 82 号, p22-48。
- 平山久雄 1985 〈官話方言声調調値の系統分類—河北省方言を例として〉,《言語研究》第 86 号。
- 遠藤光暁 2001 〈河北省、遼寧省、山東省に於ける聲調の地理分佈と變遷〉,《漢語方言論稿》,好文出版。
 ———— 2001 〈北方方言における聲調調類分岐のタイプについて〉,《漢語方言論稿》,好文出版。
- 尾崎雄二郎 1980 《中國語音韻史の研究》,創文社。
- 高田時雄 1988 《敦煌資料による中國語史の研究—九、十世紀の河西方言》,創文社。
- 滿田新造 1997 《中國音韻史論考》,朋友書店(再版)。
- 長田夏樹 1997 〈西夏語と近代漢語の成立について—包括、排除の代名詞と方向を表わす助動詞〉,《長田夏樹論述集(上)》,ナカニシヤ出版。
- 荒川慎太郎 1997 〈西夏語通韻字典〉,《言語學研究》16 号。
- 明 陸容《菽園雜記》,中華書局。
- 明 張位《問奇集》,藝文印書館。
- 明 徐孝《合併字學集韻》,北京圖書館藏本。
- 河北北京師院學院 中國科學院語言所 1961 《河北方言概況》,河北人民出版社。
- 王希哲 1991 《左權方言志》,山西聯合高校出版社。
- 史素芬、李奇 1990 《武鄉方言志》,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
- 朱耀龍 1990 《新絳方言志》,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
- 江蔭禔 1991 《朔縣方言志》,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
- 宋欣橋 1991 《孟縣方言志》,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
- 呂枕甲 1991 《運城方言志》,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
- 李小平 1991 《臨縣方言志》,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

- 李 申 1985《徐州方言志》，語文出版社。
- 金楚茵 1989《原平方言志》，語文出版社。
- 蔡 權 1990《吉縣方言志》，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
- 潘耀武 1990《清徐方言志》，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
- 楊增武 1990《山陰方言志》，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
- 喬全生 1990《汾西方言志》，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
- 張益梅 1991《介休方言志》，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
- 謝自立 1990《天鎮方言志》，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
- 溫端政 1985《忻州方言志》，語文出版社。
- 馬文忠、梁述中 1986《大同方言志》，語文出版社。
- 楊秋澤 1990《利津方言志》，語文出版社。
- 錢曾怡 1993《博山方言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石明遠 1995《莒縣方言志》，語文出版社。
- 陳昌儀 1991《贛方言概要》，江西教育出版社。
- 顏 森 1993《黎川方言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張啓煥等 1993《河南方言研究》，河南大學出版社。
- 賀 巍 1989《獲嘉方言研究》，商務印書館。
- 1993《洛陽方言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盧甲文 1992《鄭州方言志》，語文出版社。
- 照那斯圖 楊耐思編著 1987《蒙古字韻校本》，民族出版社。
- 照那斯圖 1980〈論八思巴字〉，《民族語文》第1期。
- 1981〈八思巴字研究概述〉，《民族語文》第1期。
- 1987〈八思巴字元音字母字形問題上的兩種體系〉，《民族語文》第4期。
- 1988〈有關八思巴字母ä的幾個問題〉，《民族語文》第1期。
- 1989〈八思巴字中的零聲母符號〉，《民族語文》第2期。
- 1999〈蒙古文和八思巴文元音字母的字素分析〉，《民族語文》第3期。
- 2003〈《蒙古字韻》拾零〉，收入《第八屆國際暨第二十一屆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p.25-30。
- 沈鍾偉 2005〈從《蒙古字韻》論入聲音節的複元音化〉，收入董琨、馮蒸（主編）《音史新論 慶祝邵榮芬先生八十壽慶學術論文集》，新華書店，p.310-324。
- 吳緝華 1956〈元朝與明初的海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28本，p.363-380。
- 1958〈明代的海路兼運及運河的溝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29本。
- 全漢昇、王業鍵 1961〈清代的人口變動〉，《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32本，p.139-180。
- 徐 泓 1980〈明初南京的都市規劃與人口變遷〉，《食貨月刊》（復）第10卷第3期，p.82-116。

- 1982 〈明洪武年間的人口移徙〉，《第一屆歷史與中國社會變遷研討會論文集》，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
- 1988 〈明初的人口移徙政策〉，《漢學研究》第6卷第2期，p.179-190。
- 于志嘉 1989 〈試論明代衛軍原籍與衛所分配的關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60本第2分，p.367-450。
- 1993 〈明代兩京建都與衛所軍戶遷徙之關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64本第1分，p.135-174。
- 呂昭明 2013 〈從文獻版本考證《經史正音切韻指南》的門法涵義及其相關問題〉，《日本中國語學會第63回全國大會預稿集》，p.322-326，東京外國語大學。
- Shen Zhongwei 2000 The phonetic values of divisions III and IV in the Menggu Ziyun, The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ew Series Vol.30 No.1, p.93-112.
- Shen Zhongwei 2001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vocalic h in the Menggu Ziyun – New approaches to an old problem, The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ew Series Vol.31 No.4, p.459-488.